

制度化、全球化及非抗争化

——社会运动未来之路

陈刚华

(高丽大学 政经学院, 韩国 首尔 136701)

摘要:西方社会运动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开始盛行, 关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术界对于社会运动的研究主要分为美国实证主义路线和欧洲历史哲学传统路线。研究范式也多有不同, 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理论研究传统: 一是“政治过程”理论传统, 该理论从资源动员理论中发展而来; 二是“新社会运动”理论传统。而且伴随着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成熟, 社会运动的制度化也开始形成; 随着传播媒体的发展, 社会运动的全球化也日渐凸现; 与此同时, 社会运动也朝着非抗争化之路发展。

关键词:政治过程; 资源动员; 新社会运动; 制度化; 全球化; 非抗争化; 未来之路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9)12-0033-04

社会运动不断地指出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如性别、环境、族群、权力等。西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研究作为一个迅速成长的学术领域, 在其发展过程中, 分别形成了美国的实证主义路线和欧洲的历史哲学传统路线, 先后出现了六种社会运动研究范式。历史地来看, 社会运动研究通常存在两种主要研究传统: 一是“政治过程”理论传统, 该理论乃是从资源动员理论中发展而来; 二是“新社会运动”理论传统。^[1]

一、政治过程理论分析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 社会运动兴盛年代之前, 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抗议的理论都植根于某种经济学解释, 它们都强调人们在经济上的不满。^[2]因此, 学者们开始逐渐在传统的路径之外, 发展关于社会抗议的新的解释理论。究其原因, 当时美国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 被深深地卷入到了社会运动中去。集中体现这些变化的是“新中间阶级”即来自非体力劳动职业的、相对高教育程度的人群的出现。^[3]

所以,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家拒绝了经济解释, 转而对心理学的解释产生兴趣。^[4]其中, 特德·罗伯特·戈(Ted Robert Gurr)不断强调“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个概念。“相对剥夺”这个词乃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 它强调在人们希望他们的政府可以提供的东西——即他们期待拥有的东西——与他们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之间存在的落差。这种欲望和实际预期之间的鸿沟被其称为“相对剥夺”, 也简称为“RD”。特德·罗伯特·戈相信, 相对剥夺的程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参与到抗议活动中去。^[5]另一

学者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es)则提出了一个被称为“起义或者革命的 J 形曲线”的心理学理论。这里说的所谓 J 形曲线, 指的就是在一个 X 轴表示时间、Y 轴代表某种 GDP 的经济量度的坐标系里面一个点状的倒 J 形曲线。他相信, 往往在情况发生改善一段时间之后却出现突然的经济倒退的时候, 人们会发动起义。在这个倒退之后(就像一个倒 J 形), 人们造反, 是因为他们的预期超出了经济现实。他们在仍然非常穷的时候不会参与造反, 只是在一段时期的增长和改善之后, 人们的预期继续提高而实际经济情形反而衰退之时, 他们才参与到造反之中。^[6]

以上的几种社会运动理论, 都是基于美国心理学“挫折——攻击理论”路径下的研究。这些理论的基础都出自于假设人在受到挫折时, 或者心理感觉到挫折时, 他们的行动会变得有攻击性。但是这种理论假设具有的明显缺陷就在于并不是每个人受到挫折时都会产生攻击的心理。当然这种基于个人心理的研究, 也常常不能解释集体行动出现的原因。也就是社会运动、起义或者是革命是如何产生的。这就要求在对个体研究以外, 还要对集体行动进行研究。这也成为了第二代社会运动理论——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出现的根本动因, 以其来克服心理学研究路径的不足。

20 世纪 70 年代, 理性选择范式的兴起突破了崩溃理论认为社会运动是社会变迁的附带现象, 是由与社会变迁相伴的社会安排和连接的崩溃导致的理论认识。促成这一转变的

作者简介: 陈刚华(1976—), 男, 韩国高丽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韩国高丽大学行政学系国家 BK21 事业团的资助。

主要因素是经济学家奥尔森 (Mancur Olson) 的集体行动理论。资源动员学派的理论家继承了奥尔森的基本假设, 同样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定义为“理性经济人”。

奥伯肖尔是资源动员学派的早期成员。他研究的中心是个体在嵌入群体和组织这样一个情景下的成本和收益计算以及微动员等问题。他认为, 由奥尔森提出的“选择性激励”这一观点在解释理性行动者卷入集体斗争上是足够的。麦卡锡 (John D. McCarthy) 和扎尔德 (Mayer N. Zald) 则提出了社会运动专业化理论。他们认为, 美国自 60 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经历了专业化转向, 社会运动不是由草根民众所发起与主导, 而是由专业改革者所领导, 这些社会运动组织最终会演变为具有科层化结构的利益群体, 通过游说公共官员、准备提交报告和形塑公共舆论来发挥其影响力。

大体而言, 资源动员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方向: 一是分析社会运动组织 (social movements organization) 的形态。资源动员理论关于“资源”的理解非常宽泛, 它既包括有形的金钱、资本和设施, 也包括无形的领袖气质、组织技巧、合法性支持等等。资源动员理论认为, 资源的组织化程度是决定一项运动成败的关键, 组织化程度越高, 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因此, 一部分资源动员理论家倾力研究社会运动组织的运作过程和机制, 比如招聘网络 (recruitment network) 的建构、成员资格的确定、领袖的产生、行动的策略等等。二是分析社会运动的动员背景 (mobilization context)。与热衷于研究社会运动组织的学者不同,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 社会运动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运动组织的运作, 而是同时取决于社会运动组织所嵌入的社会背景。具体来说, 又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所在的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或压制性。在资源动员理论看来, 政治体制对社会运动来说,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机会结构”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它给定了某种社会运动所面临的政治机会。很显然, 在不同的政治机会结构下, 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意识形态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 在开放的、多元主义的政治体制下, 社会运动的发动可能就要容易得多, 斗争方式也可能会比较温和; 相反, 压制性的、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就可能会导致激进的社会运动。但是, 另一些资源动员理论家也认为, “政治机会结构”并不是社会运动的唯一决定因素。除了政治机会结构以外, 社会运动的动员背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即“社会运动产业” (social movement industry) 的内部关系以及“社会运动部门” (social movement sector) 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 既然社会运动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动员过程, 那么, 社会运动产业内部不同运动之间以及不同运动组织之间、整个社会运动部门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源上的竞争。^{[96][97]}

艾辛格 (Peter Eisinger) 提出了政治过程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政治机遇结构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ies)。在他看来, 不同城市会形成不同的政治机遇。在研究不同城市的种族抗议之后他发现, 在极端开放与极端封闭的条件下, 抗议发生的频率较少; 相对而言, 种族抗议最容易出现在一个开放性与封闭性混合的政治系统中。蒂利 (Charles Tilly) 将社会运动的政治环境由地方政府扩大到了国家, 强

调社会集体抗议与国家息息相关。他认为, 国家的指令和要求也会影响到从税收到如何界定自由和法律等在内的所有事情, 以及判定人们斗争手段的合法性。对于挑战者来说, 各种政治条件有可能分别形成有利于或阻碍实现其诉求的机遇或限制。麦克亚当分析了美国民权运动的政治过程。他提出, 决定社会运动能否崛起的因素包括以下三类: (1) 扩大的社会政治机遇; (2) 草根组织的力量; (3) 认知解放。

当然, 政治过程理论从资源动员理论发展而来, 也接受理性选择范式的基本假设, 但同时认为政治权力关系是不对称的。这种理论范式指出, 社会运动中的主要挑战者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受排斥的群体或被边缘化的群体。所以, 社会运动就与政治体制联系在了一起。

二、新社会运动理论研究

作为政治学与社会学分支的社会运动研究,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正引起普遍关注, 但对社会运动概念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种公认的界定。^[98]西德尼·塔罗认为, 社会运动是“以潜在的社会网络和使人产生共鸣的集体行动框架为基础, 能发展出对强大对手保持持续挑战力的斗争政治事件”。^[99]而我国社会学学者赵鼎新认为, 所谓社会运动, 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行为; 集体行为, 就是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体制外政治行为。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种体制外政治行为, 从而应与选举、政府会议和官方集会等体制内政治行为相区别。^{[99][100]}

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 最早的代表性人物当属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道格·麦克亚当 (Doug McAdam) 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他们一起发展了一种被他们称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政治过程模型 (political process model) 的理论。根据这个模型, 在任何一个成功的抗议活动中都包含有几个要素。首先是一个动员网络; 即人们拥有的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联系, 这种关系网络被看作是促成动员的要件。第二个被他们称为政治机会结构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OS); 如蒂利强调的国家的压制能力, 或国家政权是分裂还是统一等等。第三个要素就是斗争手法。而第四个要素他们称之为集体行动框架 (collective action frame)。这与斗争手法的概念有所重叠, 是指如马丁·路德·金之类的领袖借以展示他们的理念以动员人民的方式。所谓框架是指可以与潜在的跟随者在文化认同上产生共鸣, 借以规范抗议的标志和旋律。^[101]

社会变迁成为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条件。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比如, 在化解社会矛盾能力强的国家, 社会运动或革命就会推迟甚至避免发生。而在化解能力弱的国家, 发生某种社会变迁后, 社会运动或革命很可能会接踵而至。将人类的政治生活看成一个有着相应的结构和功能并且处于不断变迁的环境中的开放系统, 这无疑会成为理解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模式。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 (David Easton) 是这种模式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强调的政治的权威性的价值分配 (Politics as Allocation) 更多是一种系统行为, 是政治体系与环境互动的结果。根据政治系

统论的观点,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政治系统作为一个权威性利益分配的主体,它受制于社会环境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政治系统的任何决定和政策对社会的各方面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塑作用。^{[106]79}所以说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不但会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和规模,而且会影响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的间隔时间。这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关系。^{[97]182-183}

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反映出了欧洲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重要转型,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与这一社会变迁相伴而生的是新的社会怨恨、兴趣和价值(Inglehart, 1990)。^[11]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无需为温饱问题而斗争,相应地,新型社会问题(如环境、女权、人权和动物权)则日益受到重视。旧的认同基础(即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日益削弱,新的先进阶层(如学生)(Touraine, 1971)^[12]和新的认同(如学生、女性、同性恋者和环境保护者)逐渐兴起。因此,欧洲从60年代以来的许多社会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Cohen, 1985),^[13]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体现,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Melucci, 1989),^[14]是为控制和定义主流文化而进行的斗争(Touraine, 1985)。^[15]这场发生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社会运动不仅提出了政治要求,而且还提出了文化要求。比如,对性别平等的要求,对简单的生活方式的要求,以及关于文化、认同和政治关注的议题。研究社会运动的人开始认识到革命也必然含有某种文化因素。他们关注内涵和价值以及国家建构等诸议题。这个时期在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学者们开始发展一项他们称之为新社会运动的理论。^{[20]69}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运动显示其特征的不再是围绕着劳动组织的斗争,而是围绕着控制传播系统的斗争,这对于新社会运动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16]

到了60年代以后,欧洲社会科学界积极寻找新的理论解释,形成了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视角。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为什么会掀起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浪潮?这些社会运动与此前作为社会运动主要形式的工人运动或劳工运动相比,又有什么新的特征?这些社会运动的出现及其新特征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6]67}在面对如此种种的理论研究中,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家们认为社会运动的出现是因为冲突的社会基础转型的结果,这种转型产生了新的冲突并且改变了集体认同的建构进程。

图海纳(Alain Touraine)是建构新社会运动论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认为社会运动不是一种来自边缘的对既有秩序的反抗,相反,它们是相互对抗以掌控社会生产的主要势力,也是为了形塑历史性格的阶级运动。哈贝马斯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演变。他将社会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认为系统整合主要由国家和大众媒介等驾驭机制产生;社会整合是从社会化和生活世界的意义创造中获得的。梅卢西(Alberto Melucci)在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基础上,把当代社会描绘为一种高度分化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行动主体的创造力受到鼓励,但与此同时又要

求更紧密的社会整合,并扩大对人类行动动机的控制。奥菲(Claus Offe)也在合法性危机的情境中解释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他认为,这种合法性危机是由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所致。就在西欧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们强调社会变迁——包括国家的变迁——对社会运动的影响的同时,秉持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们近来却在关注国家——社会关系的互动,同时也在关注研究运动组织、行动者网络以及运动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建构过程。^{[17]66}我国学者赵鼎新在整合西欧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和美国的政治过程理论后,认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因素可以概括为:变迁、结构、话语。并以此三要素作为研究社会运动的基本方法。

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所谓变迁,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所谓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及其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国家的结构包括国家的性质(如民主的、威权的或独裁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如法律选举型的、意识形态型的或绩效型的),以及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有的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结构包括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各类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及其性质(如多元化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生产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如资本家——工人关系、地主——佃农关系,等等)。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emergent norm),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等。^{[9]173}

三、社会运动制度化、全球化及非抗争化

1. 社会运动的制度化。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9]171}一个社会发生危机的根源不在于民众的态度或选择,而在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技术性自我调整能力和制度创新的供给能力。^{[10]76}所以对于大多数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而言,影响或决定其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9]173}正如我们所知,社会运动常常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之一,是制衡政治权力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是社会制约权力的重要组成因素,是用来废除或至少削弱政治统治结构和社会统治结构的工具。^{[18]291}如果一个社会抗议普及化现象产生,那么它反映的是一个更庞大的变迁过程,也就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建构,朝向一个我们所谓的“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趋势。所以制度化的结果,能够使得社会运动不再是某种过渡的、异常的现象,而进一步能整合成为常态民主生活的一部分。^{[10]76}

2. 社会运动的全球化。

不仅集体行动的形式和发生率将会随着民族国家日益侵入地方性的生活而发生变化,而且国家的指令和要求也会影响从税收到如何界定自由和法律等在内的所有事情。国家带来了社会运动需要加以处理的问题;同时,国家促进或阻

碍了社会运动,降低或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又或与运动结盟,或反对运动。^{[18](p391)}而且随着现代社会问题体系日益复杂化,一方面其涉及的范围的广度将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甚至会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在全球公民社会还只处于初级阶段的时期,解决问题的国际机制尚需完善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会采用全球性的社会运动的方式来表达利益主张。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使这种跨国界的联合行动成为现实。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正逐步下降,公民对政治的热情减弱,但是同时民众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感却又在加强,虽然对对利益的关注仍然是重点。但是对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的关心度也在增加,关注的重心逐步从原来的阶级、意识形态、党派斗争、战争逐步转向关系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民主与人权以及道德伦理观念等问题。^{[10](p76-77)}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推进,以国家主权为主轴的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全球化治理”导致国家主权有削弱的趋势,这在促进社会运动兴起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运动价值和目标的多元化。^{[9](p68)}

3. 社会运动理论的新发展——非抗争化。

学者希德尼·塔罗所写的一本颇具影响的著作《运动中的权力》,已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政治过程理念模型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简述。另外在此书中,塔罗还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个称之为“抗议循环周期”的观点。借此他试图揭示为什么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比如20世纪60年代期间,如此多的不同类型的抗议为什么都同时发生;某些抗议是怎样推动其他类型抗议的发生以及究竟如何能够揭示这些循环周期的跌宕起伏?塔罗试图利用政治过程模型的基本要素去解释一个抗议的循环周期。而另一本由塔罗、蒂利和麦克亚当等七位斯坦福大学教授所著的《抗争性政治研究中的无声与有声》,则尝试突出那些在我们目前研究社会运动和争议性政治的路径中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课题,包括诸如宗教、情感、时间、空间、领袖以及其他一些在晚近的抗争性政治研究中还没有被充分考虑的课题。^{[2](p9-10)}

参考文献:

[1]Tim Jordan, Adam Lent, George McKay and Ann Mische.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opening statement* [J].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Vol.1, 2002, No.1.

[2]裴宜理. *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6, (4).

[3]周德明. *新社会运动:世纪末的文化抗衡*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1997, (4).

[4]Gurr, Ted Robert.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5]James C. Davies. *When Men Revolt and Why* [M]. New York: Free Press, Introduction, 1971.

[6]冯仕政.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3, (5).

[7]王冠华. *晚近西方社会运动研究* [J]. *东岳论丛*, 2006, (5).

[8]西德尼·塔罗. *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 [M]. 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9]赵鼎新.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 [J]. *社会学研究*, 2005, (1).

[10]盛凌振. *社会运动的政治分析* [J].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005, (1).

[11]Inglehart, Ronald. *Culture shift in A 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Touraine, Alain. *The May Movement: Revolt and Reform*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13]Cohen, Jean.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J]. *Social Research*, Vol.52, No.4.

[14]Melucci, Alberto.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5]Touraine, Alain. *An Introcuo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J]. *Social Research*, Vol.52, No.4.

[16][英]艾尔曼. *社会运动和社会理论* [J]. 史宇航, 译. *社会学*, 1984, (2).

[17]董国礼. *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运动研究:梯利的集体行动理论* [J]. *学海*, 2007, (5).

[18][美]艾尔东·莫里斯. *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申 华